

阜阳方言“佛白”一词的源流考

李真

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，浙江杭州，311100；

摘要：本文以阜阳方言中的双音并列词“佛白”为研究对象，深入探讨其词义内涵与形成源流。“佛白”在阜阳方言中特指“人啰嗦、麻烦、讨厌、多嘴”，核心语义指向负面言语行为。通过语音演变、文化渗透与词汇构词理据的多重考证发现：“佛”“白”二字均含“言说”义，其中“佛”是“说”在阜阳方言发音习惯影响下的语音变体，而“佛白”的形成既与中原官话的语音演变规律相关，又深受佛教文化在皖北地区的传播影响，同时体现了物性结构在方言词汇构建中的核心作用。

关键词：佛白；阜阳方言；语音演变；佛教文化；物性结构

DOI：10.69979/3029-2735.26.02.084

引言

阜阳地处安徽省西北部，其方言隶属于中原官话皖北片，根据贺魏的分区标准，主要归入商阜片，内部可细分为东部、西部、北部、沿淮及中部五个方言小片^[1]。作为阜阳方言中的常用口语词，“佛白”一词被《阜阳民俗文化研究》《阜阳历史文化概观》等文献收录，语义聚焦于“啰嗦、麻烦、讨厌、多嘴”，但其字面形式与实际语义之间存在明显断层。本文拟从语音演变、文化背景、词义理据三个维度，对“佛白”的源流进行系统考证。

1 “佛”字的语义与语音溯源

《汉语大词典》《辞源》等权威工具书均记载“佛”（fó）的核心义为“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及其相关宗教活动”，未收录“言说”义项。但结合阜阳方言的语音特征与文化语境分析，“佛”的“言说”义实则源于语音演变与文化渗透的双重作用。

1.1 语音演变：“说”的方言音变

阜阳方言依据地理区位与语音特征划分为五个小片，其中东部、西部与中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：卷舌音[s]在合口呼韵母前发生唇齿化变异，即当声母[s]与合口呼韵母[uo]、[ue]、[ua]、[uei]相拼合时，不仅声母[s]会读作唇齿擦音[f]，韵头[u]也会随之脱落，典型例证便是[suo]在方言中读作[fo]。^[2]

乔全生先生指出，古书母字读作[f]声母的语音现象，最早可追溯至元明时期，元杂剧本中留存有“说”“佛”同音的直接佐证。元李寿卿所著《度柳翠》一折中，月明和尚有如下自白：“有人来问贫僧如何是佛，我说你

说的便是；有人来问贫僧如何是道，我道你道的便是。”该段文字明确运用了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，以“说”谐“佛”之音，同时以“佛道”之“道”谐“说道”之“道”，形成双重语义关联^[3]。元曲作为以当时北方方言为创作基础的文学载体，其语音记录具有重要的方言史价值。“佛”字属奉母字，在北方方言绝大多数区域历经清化后均演变为[f]声母，仅山西平遥、交城、文水等七县仍读作[x]声母，且此读音仅限洪音字；而北方方言中“说”字并未出现[x]声母的演变轨迹，由此可推断，“说”与“佛”的同音关系，实则是“说”的读音向“佛”的[f]声母靠拢演变的结果。

据《汉语方言地图集·语音卷》076图记载，“书”字声母读作擦音[f]的现象，主要分布于晋南、陕西、鲁西南以及与山东交界的河南、安徽部分地区，其中明确记录了阜阳北部的亳州与东北部的利辛两地“书”字声母为[f]，这与阜阳方言中卷舌音唇齿化的演变规律形成互证^[4]。方言地理不仅是单纯的地理分布现象，更是承载历史文化内涵的人文现象，因此对区域方言地理的研究，必须结合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脉络。阜阳方言既存在历时层面的古今演变差异，也存在共时层面的地域分布分歧，造成这种方言分歧的成因复杂多样，其中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是关键影响因素之一^[5]。阜阳方言中卷舌音在合口条件下的唇齿化发音习惯，与山东、山西部分地区的方言特征高度契合，而阜阳旧志的记载印证了这一语音关联的历史渊源——阜阳历史上曾发生大规模的山东移民迁入事件^[6]。山东枣庄方言中[s]声母拼合口呼韵母的字今读[f]声母，这一方言特征与阜阳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完全一致，结合这一历史移民背景与语

音对应关系,可初步推断阜阳方言“佛白”一词的原始形式应为“说白”,其核心演变机制便是“说”字在方言中读作“佛”的[f]音。

《汉语大词典》收录“说白”一词,其注音为[shuō bái],并记载三大义项:①戏曲台词;②说话、表述;③指言说无根据、无法实现的内容。后两项与“佛白”核心语义一致,差异仅在于“佛白”附加“啰嗦、讨厌”的负面情感色彩。结合阜阳地区[s]声母拼合口呼韵母字今读[f]声母的语音习惯,可进一步佐证:阜阳方言口语中的“fó bái”,最初的书写形式应为“说白”。受方言发音习惯的制约,加之民间口语传播中对字词规范写法的认知缺失,民众便以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、发音完全一致的“佛”字替代“说”字,最终形成“佛白”这一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。

1.2 文化渗透:佛教文化的影响

安徽北部作为南北交通要冲,是佛教早期渗透区域之一。事实上,佛教传入安徽的时间与传入中国汉地的历程几乎同步,其传播速度与覆盖范围远超一般区域文化的扩散节奏^[7]。荷兰汉学家许里和考证,约在公元50年前后,佛教已传入皖北、豫东、鲁南交界地带^[8],而阜阳正处于这一核心圈层的关键节点,为佛教文化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唐宋至明清,阜阳佛教盛行,这一时期阜阳境内不仅原有佛寺得到持续扩建,新的佛教场所亦不断涌现,形成了“寺塔林立、僧众云集”的文化景观。《阜阳府志》《颍州志》记载境内佛寺林立,始建于北宋的资福寺、清康熙年间修建的文峰塔等实物遗存,印证了佛教的深远影响。《康熙字典》注“阜,佛寺,香界亦曰香阜”,进一步揭示阜阳地域名称与佛教的关联。

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体系,佛教在向中国汉地传播的过程中,形成了多元化的传播矩阵,涵盖口头传播、文献传播、实物传播、艺术传播等多种灵活有效的传播方式,僧尼诵经说法的口耳相传模式,在民众认知中形成“佛教徒勤于动口”的集体印象^[9]。此外,敦煌文献中“佛”字常常被写作俗字“仏”。

况般若诸仏之母,金刚难坏之句。(《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》)

如过去诸仏,出兴于世。(《发愿文》)

陆忠发先生认为“仏”是依据佛教徒“动口宣讲”的特征所造的俗字^[10],后简化为“佛”。这一字形演变暗示“佛”与“言说”的隐性关联,而“佛白”的负面

色彩,正是源于对“佛教徒过度言说”的引申,由“勤于动口”衍生出“啰嗦、多嘴”的语义。随着汉字的规范化发展,“仏”字逐渐被通行字“佛”替代,但这种字形所承载的“言说”隐性语义,却在方言使用中得以保留和传承。

2 “白”字的“言说”义演变

“白”(bái)的“言说”义演变脉络清晰。《现代汉语规范字典》收录其动词用法“说明、陈述”,如柳宗元《童区寄传》中“虚吏白州,州白大府”,此处“白”即“禀告、告知”。唐宋时期,“白”衍生出“口语化陈述”的含义,形成“白话”一词,与书面语“文言”相对;明清时期,进一步发展出“夸夸其谈、说空话”的负面义。如:

刘伶纵酒放达评:“不是大话,亦不是白话。”(《初潭集》卷十七)

紫鹃道:“你妹妹回苏州老家去。”宝玉笑道:“你又说白话。苏州虽是原籍,因没了姑父姑妈,无人照管,纔就了来的。明年回去找谁?可见是扯谎。”(《红楼梦》第五七回)

近现代以来,“白”的“言说”义在书面语与方言中均得到延续与发展,衍生出“闲话、搭话”的口语化义项,如李劫人《死水微澜》:“吃叶子烟时,总要递一支给他,于不要紧的话时,总要找他搭几句白。”此处“搭白”即“搭话、闲聊”,“白”直接等同于“话、言语”,语义更为凝练直白,体现了“言说”义在口语中的进一步简化。同时,“白”的“言说”义在各方言中形成了丰富变体,如苏州方言中“苏白”、四川方言中“搭白”、湖北方言中的“说白”等,核心语义均围绕“言语、说话”展开,印证其强大的地域传承力。

3 “佛白”一词的词义理据

3.1 比喻修辞的构词作用

比喻是方言词汇构词的常用修辞手段,其核心是借助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性实现语义表达。这一构词方式在阜阳方言中尤为普遍,形成了一批兼具地域特色与语义关联性的词汇。例如,因“植物叶子”与“薄被子”共同具备“轻薄”的核心特征,阜阳方言中便以“盖体叶子”作为喻体化词汇,用以指代“薄被单”,通过特征关联实现语义的直观传递;又如,麻雀羽毛的黑褐色斑点与人脸痣相似,因此阜阳方言以“黑雀子”作为喻称,借指人体面部的“痣”,使抽象的身体特征获得具象化表达^[11]。

候友兰指出：“通过明喻造的形容词，前一语素一般是喻体，后一语素并不是本体，而只是指明喻体和本体所相似的性状或行为动作，本体并不在词中出现，而一般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出现。例如，我们说‘这水冰凉的’，意思是‘这水像冰那么凉’，其中的本体很明显是‘水’，而不是‘凉’，‘凉’只是指明喻体‘冰’和本体‘水’具有相似的性质。”^[12]同理，阜阳方言“佛白”中，“佛”作为喻体暗指“佛教徒勤于动口”的特征，本体为“人”，通过“佛”与“人”在“言说行为”上的相似性，实现“人如佛般多言”的语义表达，进而引申出“啰嗦、讨厌”的负面评价。

3.2 物性结构的语义支撑

生成词库理论强调词汇的生成性，物性结构作为核心组成部分，包含构成、形式、功用与施成四大属性，其中形式角色作为复合名词的重要语义理据，既存在显性的直接表达，也包含隐性的间接映射。从表达特征来看，形式角色通常以修饰性语素的形式存在于复合词中，为了凸显所指事物的核心性状，常常以其他事物作为比喻载体，其语义解读并非依赖语素义的直接叠加，而是需要以人们对喻体事物的已有概念认知为基础，经过抽象的思维加工与语义联想，才能准确把握所指事物的性状特征^[13]。

阜阳方言中“玉秫秫”（玉米）以“玉”作为形式角色的承载语素，以比喻的方式暗示了玉米“色泽洁白、颗粒圆润”的核心性状，读者无法从“玉”的原始语素义（玉石）中直接获取其在该词汇中的形式角色功能，而必须调动自身关于“玉”的概念知识储备，通过“洁白、圆润”的性状联想，才能准确关联到“玉秫秫”所指代事物的核心特征。与之类似，“佛白”一词的语义解读同样依赖物性结构中形式角色的隐性支撑：“佛”字作为形式角色的喻体载体，其语素本义与“言说、啰嗦”的语义并无直接关联，必须借助阜阳地区深厚的佛教文化背景知识，结合民众对“佛教徒勤于动口宣讲教义”的集体认知原型，通过语义联想与抽象思维加工，才能深入理解“佛”所承载的“过度言说”的隐性语义，进而完整把握“佛白”一词“啰嗦、多嘴”的核心内涵。这一过程搭建了语言知识与非语言知识之间的互动桥梁，充分体现了物性结构在方言词汇语义构建中的核心作用。

4 小结

阜阳方言“佛白”一词的形成，是语音演变、文化渗透与构词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从语音层面看，“佛”是“说”在阜阳方言唇齿化音变后的记写形式，“佛白”源于“说白”；从文化层面看，佛教在皖北的传播形成“僧徒勤于言说”的集体认知，为“佛”赋予隐性“言说”义，并衍生出负面情感色彩；从构词层面看，“佛白”通过比喻修辞与物性结构的双重作用，实现了语义的形象化表达。这一词汇的源流考证，不仅揭示了方言词汇与语音演变、地域文化的内在关联，也为中原官话的词汇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孟庆惠. 安徽省志 方言志[M]. 北京: 方志出版社, 1997: 89-92.
- [2] 王琴. 阜阳方言[s]读[f]现象[J].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09, (3): 58-62.
- [3] 董绍克. 元曲“说”读“佛”例[J]. 中国语文, 1996, (01): 44.
- [4] 曹志耘主编. 汉语方言地图集 语音卷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8: 154-155.
- [5] 李良玉主编. 阜阳历史文化概观[M]. 合肥: 黄山书社, 1998: 135.
- [6] 阜阳县统战志编写组编. 阜阳县统战志[M]. 1985. (09): 436.
- [7] 余世磊主编. 安庆禅宗图说[M]. 北京: 宗教文化出版社, 2018: 6.
- [8] (荷) 许里和著. 佛教征服中国, 李四龙等译. [M].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1998: 38.
- [9] 陈文英著. 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论[M]. 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2007: 158.
- [10] 陆忠发. “仏”字造字考说[J]. 汉字文化, 2020, (13): 4-6, 17.
- [11] 吕玲娣. 阜阳方言俗语词例释[J].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19, (4): 39-42.
- [12] 侯友兰. 比喻词补议[J]. 汉语学习, 1997, (4): 19-21.
- [13] 朱皋. 物性结构与阜阳方言复合名词词义理据[J]. 辽东学院学报, 2017, (1): 95-99.

作者简介：李真（2000—），女，安徽阜阳人，硕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汉语史。